

曝書亭全集

朱彝尊／著

王利民 胡愚
张祝平 吴蓓
马国栋／校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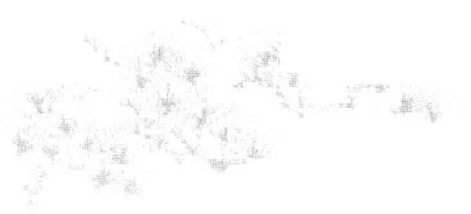
吉林文史出版社

曝書亭全集

• 朱彝尊／著 •

• 王利民 胡愚 張祝平 吳蓓 馬國棟／校點 •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曝書亭全集 / (清) 朱彝尊著; 王利民校點. — 長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472-0156-5

I. ① 曝 ... II. ① 朱 ... ② 王 ... III. ① 古典文學—作品集—中國—清代
IV. ① 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0) 第 034775 號

Pushuting Quanjì

曝 書 亭 全 集

著 者 (清) 朱彝尊

校 點 王利民 胡 愚 張祝平 吳 蓓 馬國棟

責任編輯 王爾立 崔博華

裝幀設計 柳甬澤

責任校對 崔博華

出版發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長春市人民大街4646號)

網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長春第二新華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開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張 67.5

印 數 1-1000

字 數 1728千字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價 198.00元

書 號 ISBN 978-7-5472-0156-5

凡 例

一、本書由《曝書亭集》、《曝書亭集外稿》、《曝書亭集外詩文補輯》、《附錄》組成，收錄朱彝尊詩、詞、曲、文，力求完備，故名《曝書亭全集》。《附錄》部分收錄朱彝尊傳記、碑誌、行述、年譜，俾助讀者了解其人生平概況。

二、《曝書亭集》、《曝書亭集外稿》之各家序跋依舊保留。《曝書亭集外詩文補輯》依照《曝書亭集外稿》體例，以文體分類編輯。每類篇幅多寡不均，酌情分爲十卷。所輯佚文原無標題者，據內容擬定標題。本書整理範圍爲標點、校勘和輯佚。

三、《曝書亭集》以上海涵芬樓影印原刊本爲底本，此底本簡稱四部叢刊本，以下列各本入校：

- (一)清乾隆間秀水朱氏刻本，簡稱乾隆本。
- (二)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
- (三)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朱氏潛采堂刊本，簡稱潛采堂本。
- (四)清光緒十五年(1889)會稽陶闇寒梅館刊本，簡稱寒梅館本。
- (五)民國二十六年(1937)上海國學整理社排印本，簡稱整理社本。

四、《曝書亭集外稿》以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馮登府、朱墨林輯潛采堂刻本爲底本，校以清道光二年(1822)潛采堂重刻本和清光緒四年(1878)秀水孫福清望雲仙館刊《樵李遺書》本。

五、《曝書亭集》、《曝書亭集外稿》俱以《南車草》、《竹垞文類》、《騰笑集》及其他詩文詞集參校，主要參校本開列如下：

- (一)《南車草》，附《薇堂和章》，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蔣楷重刊本；
- (二)《竹垞文類》二十五卷，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涇川刻本；
- (三)《竹垞文類》二十六卷，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增修本；
- (四)《騰笑集》，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曝書亭刻本；
- (五)《鴛鴦湖樞歌》，清乾隆四十年(1775)海鹽朱芳衡刻本；
- (六)《浙西六家詞》，清康熙十八年(1679)錢塘龔氏玉玲瓏閣刻本；
- (七)《江湖載酒集》，臺北文海出版社據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朱氏手稿本影印《清代稿本百種彙刊》本；
- (八)《蕃錦集》，清康熙十七年(1678)嘉善柯維楨刊本；
- (九)[日本]村瀨誨輔選編次《朱竹垞文粹》，日本天保5年(1834)大阪青木嵩山堂刻本；
- (十)李富孫纂《曝書亭集詞注》，清嘉慶十九年(1814)校經廬刊本；
- (十一)翁之潤輯《曝書亭詞拾遺》，附《曝書亭詞志異》，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刊本；
- (十二)葉德輝編次《曝書亭刪餘詞》，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刊本；
- (十三)吳逢原、陳維崧、吳本嵩、潘眉選《今詞苑》，清康熙十年(1671)南澗山房刻本；
- (十四)顧貞觀、納蘭性德編選《今詞初集》，清康熙十六年(1677)刻本；
- (十五)佟世南選《東白堂詞選初集》，清康熙十七年(1678)刻本；
- (十六)張淵懿、田茂遇輯《清平初選》後集，清康熙十七年刻本(1678)；

- (十七)卓回編《古今詞匯》，清康熙十八年(1679)刻本；
- (十八)李光基輯《梅里詩鈔》，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承雅堂刻本；
- (十九)侯文燦選《亦園詞選》，清康熙間刻本；
- (二十)聶先、曾王孫編《百名家詞鈔》，清康熙綠蔭堂刻本；
- (二十一)沈時棟選《古今詞選》，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瘦吟樓刻本；
- (二十二)《國朝詞選補鈔》，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稿本；
- (二十三)夏秉衡編選《歷朝詞選》，清乾隆十六年(1751)刻本；
- (二十四)蔣重光選輯《昭代詞選》，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經鋤堂刻本；
- (二十五)薛廷文編選《梅里詞緒》，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 (二十六)姚階編次《國朝詞雅》，清嘉慶三年(1798)刻本；
- (二十七)傅燮詞輯《詞觀》，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天尺樓鈔本；
- (二十八)譚獻纂錄《篋中詞》，清光緒八年刻本；
- (二十九)朱孝臧原編、張爾田補錄《詞薈》，民國二十一年(1932)《彊村遺書》本；
- (三十)王昶纂《國朝詞綜》，《續修四庫全書》第1731冊影印原刻本；
- (三十一)蔣景祁撰次《瑤華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影印康熙二十五年(1936)天藜閣刻本；
- (三十二)《全清詞·順康卷卷》，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
- (三十三)《感舊集》，王士禎輯、盧見曾等補，清乾隆十七年刻本；
- (三十四)《梅里詩輯》，許燦編，清道光三十年嘉興刻本。
- 六、凡同一論著不同版本文字兩通而涵義不同者，出異文校記。一般虛字有出入，文義無殊者，不出校記。凡是底本不誤，他本誤者，不出校記。
- 七、目錄及正文中的文字基本上保持原貌，古今字、異體字、俗體字、通假字一般均仍其舊，不作改動。少數生僻字、不規範字在不產生歧義的情況下，改為通行字。
- 八、底本一般筆劃訛舛、字形混同的明顯誤刻，予以徑直改正，不出校記。
- 九、避諱字一般不作改動，但缺筆字予以補足筆劃，為避清諱而改動古代人名、書名及年號者予以回改。
- 十、原文殘缺及脫漏字用□表示，原刊為墨釘或由於塗抹無法辨識之處用■表示。原刊原稿行間為表示尊敬而抬空或留白之處，改為今例。
- 十一、每篇佚文出為題注，標以序號，說明出處。校記、題注均置於頁末。
- 十二、對底本和參校本採用簡稱，如：《曝書亭集》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朱稻孫刻本，簡稱“原刊本”。
- 十三、標點符號依照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標點符號用法》的規定，一般使用逗號、句號、頓號、分號、冒號、引號、間隔號、括弧和書名號，少用問號、嘆號，不使用專名號、省略號、破折號、着重號和連接號。
- 十四、原原本本引用他人著述的文字，加引號。刪略引用及舉稱大意者，一般不加引號。
- 十五、集內文章根據文意，酌情分段。
- 十六、全書文字採用繁體橫排。

前言

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號竹垞,別署金風亭長、醞舫、小長蘆釣魚師,行十,浙江秀水(今浙江嘉興市)人。明崇禎二年(1629)八月二十一日未時,朱彝尊生於浙江嘉興春花橋東的碧漪坊。

秀水朱氏先世自吳江盛澤遷於秀水商河蕩。至彝尊高祖朱儒,以醫術走上仕途。彝尊曾祖父朱國祚於明萬曆十一年癸未科舉進士第一,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少傅兼太子太傅歸里。卒,贈太傅,諡“文恪”。朱國祚著有《介石齋集》二十卷、《孝宗大紀》一卷、《冊立儀注》一卷,編有《皇明百大家文選》十七卷。這位狀元出身的內閣大學士標誌着秀水朱氏家族科舉仕宦的巔峰。彝尊祖父朱大競曾任雲南楚雄府知府,在任廉節自礪,以至於辭官回家奔喪時,拿不出治裝、雇車船的錢,楚雄府城的百姓作歌謠讚頌朱大競道:“清貧太守一世難,百鳥有鳳鳳有鸞。”彝尊生父朱茂曙於天啓元年(1621)補秀水縣增廣生,入清後棄去。朱茂曙是山水畫的行家裏手,著有《春草堂遺稿》、《兩京求舊錄》。彝尊嗣父朱茂暉是復社的領袖人物,天啓五年(1625)承朱國祚之蔭,得授中書科中書舍人,著有《晦在先生集》、《棘闈記》,輯有《禹貢補注》。彝尊的伯叔一輩也多是江南文苑的俊彥。朱彝尊不僅秉承了父系的家學傳承,也接受了來自母系的文化基因。其祖母徐安人是明內閣首輔徐階的曾孫女、都察院左都御史潘恩的外曾孫女,其母唐孺人則是萬曆十四年丙戌科狀元唐文獻的孫女。徐安人曾將潘恩所訂《詩韻輯略》授與朱彝尊,教他分別四聲。

雖然家門顯赫,但朱彝尊青少年時代過的並不是錦衣玉食的生活,因為其時朱家家道已中落,遇有災荒,甚至飲食難繼。經濟的衰敗無害於這個世家大族深厚的文化根基和良好的道德風範,家族的文化傳承以及先祖留下的藏書為早年的朱彝尊提供了豐富的精神乳汁。他自幼好學不倦,有神童之稱。十歲時,朱彝尊與其中表兄弟譚吉璫、左瑄、陸世楷、陸棻一起,跟從叔父朱茂暉學習。憑着過目不忘的天賦異秉,朱彝尊每天能記誦上萬字,“讀時藝至二十餘篇,每發一題,下筆千餘言立就,同學罕有儔者。”^①朱茂暉重視實學,曾對朱彝尊說:“河北盜賊,中朝朋黨,亂將成矣,何以時文為?不如舍之學古。”他用《周禮》、《春秋》、《左傳》、《楚辭》、《文選》、《丹元子步天歌》教授學生,引導朱彝尊走上了鑽研古學、研治群籍的道路。

順治二年(1645),朱彝尊十七歲,娶馮福貞為妻,因家貧入贅於馮氏。這一年,清軍南下,南明弘光朝覆滅。嘉興士民舉義抗清,慘遭屠殺,自三塔至甬里街的房屋差不多被燒光了。為避兵禍,朱彝尊隨婦翁一家遷到練浦塘,繼而移居梅會里(今嘉興王店鎮)。在這個風雅的江南小鎮,朱彝尊同朱一是、王翊、周箕、周篁、沈進、鍾淵映、范路、繆泳、王沆、褚標、李繩遠、李良年、李符、李麟友等人結為文字之交,常在一起舉行文酒之會。

^① 朱桂孫、朱稻孫《皇清欽授徵士郎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先祖考竹垞府君行述》,《叢書集成續編》本。

明清之際，江南文人結社之風盛行。順治十年（1653），以吳偉業爲首的江浙十郡文人，爲了調解幾社的兩個分社“慎交社”和“同聲社”的矛盾，在嘉興南湖集會，時稱“十郡大社”。當時，許多江南名士，如尤侗、徐乾學、鄒祇謨、曹爾堪、毛奇齡、陸圻、汪琬、陳維崧、宋德宜、宋實穎、計東、駱復旦等均來赴會。朱彝尊與其十五叔朱茂暉也參加了這一盛會，與許多文士相識訂交。

爲了解決困窘的生計，順治十三年（1656），朱彝尊應新任廣東高要縣知縣楊雍建之聘，教授其子楊中訥，並隨之南行，由江西南安越過大庾嶺，到了廣東。彝尊叔父朱茂暉的好友曹溶此時正任廣東布政使，朱彝尊常去這位前輩那裏飲酒賦詩，探討學問，並爲其甄錄《嶺南詩選》。朱彝尊的填詞實踐也始於此。終其一生，曹溶始終是朱彝尊政治上的庇護者，生活上的資助者，以及文學、學術、社交方面的引路人。朱彝尊後來把粵行之詩輯爲《南車草》，把自己與曹溶唱和的詩作輯爲《薇堂和章》。在廣東，朱彝尊還結交了明朝的孤臣孽子張家珍、屈大均、陳子升、陳恭尹等人，其中，與屈大均尤爲相契。朱彝尊回到浙江後，將屈大均的詩廣爲傳佈，使得屈氏聲名遍滿江南。

入清之後，江南各地的部分文學團體，將昔日詩酒結社之逸情一變而爲揮戈挽日的壯舉。順治十六年（1659）前後，朱彝尊與魏耕、祁理孫、祁班孫、朱士稚、屈大均等人過從甚密，暗中開展復明運動。他們的基地在祁家的山陰（今浙江紹興）梅墅。

由於前明武將孔元章的告發，以魏耕爲首的山陰抗清團體於順治十八年（1661）被清政府破獲。康熙元年（1662）十月，爲了避禍，朱彝尊與時正赴任的永嘉縣令王世顯同去永嘉（今浙江溫州），做了王的記室。從此，朱彝尊開始了長達十七年的幕僚生涯：康熙三年（1664），客山西按察副使曹溶幕。康熙五年（1666），客山西布政使王顯祚幕。康熙七年（1668年），在山東巡撫劉芳躅幕中專司筆劄。康熙十二年（1673），客直隸通永道龔佳育幕。康熙十六年（1677），龔佳育擢升江南安徽布政使司布政使，朱彝尊隨龔氏往江寧。

在這客遊南北、依人作幕的歲月中，朱彝尊身邊總帶着十三經、“二十一史”等書，公務之餘，不廢治學。爲了注歐陽修《五代史記》，朱彝尊“恒策馬縱遊，覽其廢墟塚墓之文，祠堂佛剎之記，靡不搜剔，以資考證”。^①所到之處，除搜覽金石、收集圖書外，還懷古賦詩，發爲關塞之音，留下不少佳作。這一時期，他的交遊圈也擴大了許多，與顧炎武、李因篤、王士禛、孫承澤、納蘭性德等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十幾年中，朱彝尊落拓江湖，心理上充滿了自我放逐的悲慨，而在文學創作上倒是碩果累累：其詩文集《竹垞文類》，詞集《靜志居琴趣》、《江湖載酒集》、《蕃錦集》相繼編成問世。

隨着三藩之亂平定在即，爲宣示偃武修文之意，籠絡廣大漢族士子，康熙皇帝決定舉辦博學鴻儒科這一制科盛典，破格收羅天下賢雋奇才。在總督倉場、戶部侍郎嚴沆和吏科給事中李宗孔等人的舉薦下，朱彝尊自江寧入都膺舉。此時，汪森已將朱彝尊主編的《詞綜》增訂付梓，龔翔麟彙編的《浙西六家詞》不久也刊刻於江寧。“六家”中的李良年與同爲浙派健將的高層雲、陸隴、柯崇朴兄弟等當時均爲鴻儒科徵士在京應試，沈皞日則候選待銓於京師。龔翔麟之父龔佳育本係潞河漕運使，翔麟不時來往於南北。一個現成的浙西詞人群體就這樣聚集在朱彝尊周圍。從此，浙西詞派的大旗高揚在清初的詞壇。

康熙十八年（1679），朱彝尊舉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入史館纂修《明史》。他由此拋棄了前朝遺民的身份，變成了清朝的官員。康熙二十年（1681），朱彝尊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受到

① 朱桂孫、朱稻孫《皇清欽授徵士郎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先祖考竹垞府君行述》，《叢書集成續編》本。

康熙皇帝很高的禮遇。同年，典江南鄉試，禁通關節，唯才是舉。康熙二十二年（1683），入值南書房。次年，因私帶楷書手王綸入宮抄書被劾，降一級罷官。康熙二十九年（1690）復職，補原官，兩年後，再次被罷官。前後十四年宦海浮沉，朱彝尊居留京城，應酬往來不斷，而著述不輟，撰有《騰笑集》，輯有《瀛洲道古錄》、《日下舊聞》等。

罷官還鄉的當年，朱彝尊即重遊廣東，與屈大均、梁佩蘭、陳恭尹等人相聚。康熙三十七年（1698），為刊刻所著經籍詩文，朱彝尊曾與查慎行同游福建。除了這兩次粵、閩之游，朱彝尊晚年常往來於杭州、蘇州、無錫、真州、揚州、江寧與嘉興之間。迎鑾送駕和刊刻書籍是他頻繁往來吳越之地的主要緣由。進入古稀之年後，朱彝尊撰成《經義考》三百卷，編輯並主持刊刻了《明詩綜》，完成了《曝書亭集》的校定工作，還應曹寅之請編成《鮐志》二十卷。

康熙三十五年（1696）夏，朱彝尊在竹垞別業建了座曝書亭，作為曝書之所。在曝書亭之西有“潛采堂”，他的大部分藏書分為經、藝、史、志、子、集、類、說八門藏於其中。到他七十歲時，家中藏書總計達到了八萬卷。康熙三十八年（1699），朱彝尊撰成《曝書亭著錄》八卷，並在此書目的自序中敘述了平生讀書、愛書、得書、藏書的大略經過。

在朱彝尊生命的最後兩年，嘉禾平原水旱頻仍。朱彝尊倡議設立粥廠，賑濟災民。他不僅自己拿出錢來採辦糧食，而且以耄耋之年親自主持施粥，全活了不少人。

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月十三日子夜，朱彝尊卒於家中，享年八十一歲。吏部尚書陳廷敬為朱彝尊撰寫墓誌銘說：“或史而野，或經而葩。物亦有然，為蓬為麻。嗚呼竹垞，天邪人邪。得於天者，既碩孔多。人其謂何！”

二

在清初的文學天空，朱彝尊是顆璀璨奪目的巨星。張宗楠說：“自宋迄今，詩文大家，代不乏人。求其無體不工，如吾郡朱太史竹垞，可稱卓絕。”^①對於“清朝三百年之冠”這頂文壇桂冠來說，朱彝尊是當之無愧的。不過，僅此而言，還不能概括他的文化貢獻。其實，他以等身的著作在許多文化領地建立了不可磨滅的豐碑。查慎行《曝書亭序》稱朱彝尊：“天資明睿，器識爽朗，於書無所不窺，於義無所不析。蓋嘗錯綜人物而比量之，其博物如張茂先，多識如虞秘監，淹通經術如陸德明、顏師古，熟精史乘如劉知幾、劉原父兄弟，貫穿今古，明體而達用，如馬鄙陽、鄭浹、王浚儀，而乃濟以班、馬之才，運以歐、曾之法，故其為文取材富而用物宏，論議醇而考證確。”^②陳衍《題竹垞圖》評朱彝尊說：“勝朝數學人，終首朱錫鬯。經史既淹通，詩文復跌宕。”陳氏認為，清代諸學者和文人在並兼諸家之長方面，都不及朱彝尊，“所以小長蘆，一代絕輩行”。

朱彝尊在經學方面的造詣體現在《經義考》這部輯錄體目錄學巨著中。毛奇齡在為《經義考》寫的序中說：“《經義考》者，諸儒說經之書目也。”^③該書著錄十四部儒家經典和各代學者詮解這些經書的八千四百多種論著，分別撮其提要，從文獻角度總結和反映了歷代經學發展的狀況。就其編輯之勤、考據之審、網羅之富而言，《經義考》稱得上是清代目錄學的一座里程碑。

① 王士禛著《帶經堂詩話》卷四《纂輯類》張宗楠附識，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04頁。

② 《曝書亭集》卷首，《四部叢刊》本。

③ 毛奇齡《西河集》卷五十二，《四庫全書》本。

朱彝尊在《寄禮部韓尚書書》中自述纂輯動因及體例道：“彝尊自知樸味，老而阨窮，兼又喪子，無以遣日。見近日譚經者局守一家之言，先儒遺編失傳者十九，因仿鄱陽馬氏《經籍考》而推廣之，自周迄今，各疏其大略，微言雖絕，大義間存，編成《經義考》三百卷，分存、佚、闕、未見四門，於十四經外，附以逸經、埤緯、擬經、家學、承師、宣講、立學、刊石、書壁、鏤板、著錄，而以通說終焉。”^①《經義考》著錄說經諸書，於每部書下先列撰著者姓氏、書名、卷數，次列題注，說明該書或存或闕或佚或未見，再次列原書序跋、諸儒論斷，及其人爵里，最後是他的考證按語。唐代釋智昇《開元釋教錄》部次群書，始列“存”、“佚”二目。《經義考》初名《經義存亡考》，仿《開元釋教錄》之例，僅列“存”、“佚”二目，後又增列“闕”與“未見”兩門，也因此而改名為《經義考》。“闕”者，指該書篇簡俄空，世無完帙；“未見”者，指庋藏未絕，而購覓則難。不過，有些注明闕、佚、未見的書籍，乾隆朝編《四庫全書》時，往往發現其書尚存，朱彝尊所言不盡可據。這雖然是《經義考》的不足，但冊府秘藏，非民間所能盡窺，四庫館臣也認為不必以此苛責朱彝尊。

精彩的題跋、序錄往往能對提示文獻內容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梁釋僧祐《出三藏記集》開創了鈔錄經典敘文的先例，至宋末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形成了詳盡收錄文獻序跋和雜家筆記材料的體例。《經義考》沿用這種體例而加以推廣，在每種書下編輯史傳、地理志以及各書序跋、諸家之說，或附上自己的按語，如二百四十二卷中收錄有《演聖通論》一書，書下記載了《崇文總目》中的有關資料和晁公武、陳振孫撰寫的書目提要。

《經義考》中的著錄文字及其考證辨析，旁徵博引，詳贍精當，從各個角度反映和揭示了文獻的學術價值。如卷二百七十九馬氏融《忠經》條下按曰：“《忠經》，蓋擬《孝經》而作，考之隋唐經籍藝文志，俱不載，恐是偽託扶風馬氏者。”《四庫提要》及後來辨《忠經》之偽者，皆沿用此說。《經義考》的七百多條案語包含了朱彝尊治學的心得，從中可以看出他學術功底的深厚。

朱彝尊涉獵過多種官私書目，他關於書目的題跋有《文淵閣書目跋》、《跋重編內閣書目》、《崇文總目跋》等。其自編的書目有《潛采堂書目》四種，包括《全唐詩未備書目》、《明詩綜采摭書目》、《兩淮鹽筴書引證書目》、《竹垞行笈書目》。另外，還有《曝書亭藏書目》、《曝書亭藏書目偶存》、《潛采堂宋元人集目》。

和顧炎武、閻若璩比較起來，朱彝尊的文字考證之學雖然缺乏石破天驚的偉論，但他對顧氏的音韻學研究和閻氏的考據都有所補正。朱彝尊曾在顧炎武給別人的一封信中看到，顧氏論“苓”字音義問題，認為凡“零”、“令”等字，都應當讀若“鄰”。朱彝尊對此提出質疑，他認為：“零”、“令”等字，古代人都讀若“隣”，而非“鄰”。閻若璩說“闕里”之名始於魯恭王宮有雙闕，朱彝尊在《答閻徵君書》中，舉顧炎武《肇域志》所引《史記·魯周公世家》“煬公築茅闕門”之文，說明煬公、恭王先後並有闕門，“闕里”之名從何而來不能臆定。閻若璩對朱彝尊很佩服，稱他為“聖人”。

朱彝尊的史地學成就也不遜於經學。在明史館時，他不僅擔任了《文苑傳》與《建文本紀》的修撰工作，還曾七次上書總裁，對史書編纂方法提出建議。他主張作史必須先定體例，全書才不致錯亂，《明史》編寫體例應按明朝的史事來確定。他認為修史要有資料的保證。《明史》的修纂主要依據《明實錄》，然而《明實錄》不盡可信，朱彝尊指出，《實錄》之失，患在是非不公，“明史一代之典，三百年之事蹟，詎可止據《實錄》一書，遂成信史也邪”^②。因而建議博采

① 《曝書亭集》卷三十三，《四部叢刊》本。

② 《曝書亭集》卷三十二《史館上總裁第二書》，《四部叢刊》本。

群書，途徑有三：其一、明代國家藏書。明廷的《玉牒》、《寶訓》貯藏在皇史宬，四方上於朝廷的文書貯藏在文淵閣。按舊例，刑部恤刑，行人奉使，還朝時必須納書於庫，因此各有書目，而萬曆年間內閣輔臣諭派大理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等人校理遺籍，閣中故書，十亡六七，惟有地志全部保存了下來，著錄的書籍尚有三千餘冊。通過向朝廷請求，訪之所司，這些書籍未必不可得到。其二、私人藏書。朱彝尊建議讓史館中這六十位勤學洽聞的同僚，將自己記憶中所閱讀的可資采獲的圖書，各疏所有，捆載入都，儲於邸舍，互相考索。其三、搜訪天下遺書。“開列館中所未有文集、奏議、圖經、傳記，以及碑銘志碣之屬，編為一目。或仿漢唐明之遣使，或牒京尹守道十四布政使司，力為搜集，上之史館。”^①他提出的建議被總裁官全部採納。《明史》在二十四史中之所以能被公認為是一部較好的史書，朱彝尊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朱彝尊曾為歷代史書寫了不少序跋，收錄在《曝書亭集》卷三十三、卷三十五、卷四十四、卷四十五等數卷中。這些序跋或多或少顯示出他在史學上的孤懷閎識。如《熊氏〈後漢書年表〉序》說：“予嘗憾南北國子監本范史，於《本紀》後雜以司馬氏八《志》。觀者不察，誤以為即范氏史，每著書引證，輒指為《後漢志》云云，是何異以李丙、張甲之性情，寄王乙、趙丁之軀體乎？故嘗持論，謂宜雕范史於前，而以司馬《志》附其後，并以熊氏《年表》附之，庶成一代完書。世之學者，且以吾言為迂闊而莫之行也。”^②在《莆田陳氏九朝編年備考》中，他指出：“今所傳陳桎、王宗沐、薛應旂所輯書，類皆謬誤疎略。以予觀平甫是書，簡而有要，可謂盡善矣。而陳振孫訕之，謂其去取無法，詳略失中，未免責人已甚矣。”^③朱彝尊對流入中國的日本史書《吾妻鏡》，也作了考辨式的題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鑒於歐陽修《五代史記》太簡略，而且與《通鑑》間有異同，朱彝尊從三十歲起就有志於注歐陽修《五代史記》，為此和同鄉好友鍾淵映非常勤奮地搜輯五代史料。鍾氏抄撮群書，前後六載，考證十得四五。可惜康熙六年（1667）鍾淵映因為舟車勞頓，舊疾復發，在都城旅館中病逝。朱彝尊檢查鍾氏遺物，沒有發現《五代史記注》的書稿。於是，不得不重新從《冊府元龜》、《太平御覽》等各種書籍中考證引注。入仕以後，由於參與纂修《明史》，他把這項工作暫時擱置，將書稿放置於書箱中。辭官歸田後，發現書稿大半為壁魚穴鼠所齧，已成碎紙屑了。後來，他在殘稿的基礎上續補完成，但未刊行。《嘉業藏書樓鈔本目》載有《五代史記注》稿本七十四卷。

為了逆轉明代以來的空疏學風，朱彝尊力倡博學詳考，其諸多著述表現出“博綜舊義”的共同特點，即充分吸收前人和當時學者的研究成果，綜合歸納，條分縷析，以纂成蒐錄彙輯性的著述。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曾並舉《經義考》、《明詩綜》和《詞綜》，指出“為蒐錄之業於清代，似莫盛於小長蘆釣師。”朱彝尊門人王原曾評說《日下舊聞》道：“原學文於先生，嘗聞為學由博而入，歸諸潔淨精微，乃臻極至。基始之難，莫如考據。若夫論世辨物，必要諸瑣屑，不如是不能極其情狀，識其歸趨爾矣。是書之輯，雖止考據之一端，然傳諸學者，殆亦博文之別流，掌故之小乘也。”^④朱彝尊纂錄的《日下舊聞》是當時最完備的一部北京地方志。據李慈銘《越縕堂讀書記》統計，《日下舊聞》徵引圖籍至一千六百六十九種，所切據者為張爵《五城坊弄胡衢集》、孫國敕《燕都遊覽志》、蔣一葵《長安客語》、宋啓明《長安可遊記》、劉侗《帝京景物略》、孫

① 《曝書亭集》卷三十二《史館上總裁第二書》，《四部叢刊》本。

② 《曝書亭集》卷三十五，《四部叢刊》本。

③ 《曝書亭集》卷四十五，《四部叢刊》本。

④ 王原《日下舊聞》，《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六十，《四庫全書》本。

承澤《春明夢餘錄》、周賓《析津日記》及《元混一勝覽》、《明一統志》、曹學佺《名勝志》、顧祖禹《方輿紀要》、顧炎武《北平古今記》等十餘部書。《日下舊聞》刊刻時，城西玉泉、香山等處的台沼還沒有開始建造。此後百年，太平熙皞，民物繁昌，清廷又大興土木，城市、宮殿、官署等也有了不少變化。到乾隆時，清高宗弘曆令寶光鼐、朱筠等將朱彝尊《日下舊聞》原本，刪繁補闕，援古證今，一一詳為考核，並在體例上稍作調整，擴充為一百六十卷的《欽定日下舊聞考》，清高宗還親自為之題辭。迄今為止，這仍然是一部最大的北京歷史地理文獻。

除《日下舊聞》之外，朱彝尊在翰林院期間參與過修纂《大清一統志》。晚年又與曹寅合作編撰了《臞志》，該書引用了三百六十種有關鹽政的要籍。此外編纂的多種史地學著作，數《瀛洲道古錄》、《禾錄》二種志書較為重要，這兩種書均因故而屬稿未成，也未見刊行。但從朱彝尊有關敘述及諸家目錄中可以略窺大概。《瀛洲道古錄》分制誥、講讀、儀注、選任、論議、書籍、宴賚、纂修、記注、使命、典型、廨宇、官制、雜誌、附志等 15 門，主要記載翰林院的建置沿革與遺聞軼事。《禾錄》這部嘉興地志輯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內容主要是記載一郡沿革以及山川名勝，證以前人詩文，補舊志所未備，大約與《日下舊聞》同一體例，其資料大半採自明代弘治《嘉興府志》、鄒衡《嘉興志補》及各家文集。邵懿辰《增訂四庫簡明日錄標注》卷七史部地理類將《禾錄》附記於《吳興備志》之下，並說：“振綺堂有朱竹垞手稿《禾錄》，十冊一匣，不分卷。”可見其部帙並不算小。

作為浙派翹楚，朱彝尊生前就以文學成就彪炳一代。就詩歌創作而言，朱彝尊與王士禛並峙詩壇，為南北兩大宗，世稱南朱北王。王士禛專擅風神，朱彝尊兼聘才藻，皆非浪得虛名。薛雪《一瓢詩話》說：“朱、王兩公，南北名家，騷壇宗匠。”^①杭世駿《詞科掌錄》說：“自新城、長水盛行時，海內操奇觚者，莫不乞靈於兩家。”朱庭珍更在《筱園詩話》中盛稱朱彝尊的詩歌創作成就超越了同輩詩人：“竹垞詩、古文皆成一家，兼精填詞。詩尤雄視一代，品在漁洋、荔裳、愚山之上。”^②就詩歌創作實績而言，朱、王二人難分軒輊。如果看對當時詩壇的影響，朱彝尊其實難與王士禛匹敵，這主要是因為其一生精力並非專注於詩，而其位望也不及王氏崇高，慕從者不及王氏之盛。

作為經學家，朱彝尊尊崇六經原典和漢唐注疏，注重弘揚儒家精神，明確提出“文章不離乎經術”^③，“詩篇雖小技，其源本經史”^④。他那以“醇雅”為核心觀念的詩學理論也是與宗經重道重學的思想直接掛鈎的。在性情與學問的關係上，朱彝尊認為性情是詩的本質，所謂“詩之所由作，其情之不容已者乎”^⑤，但針對當時詩家空疏淺薄的弊病，他又強調性情須輔以學問，經史學問作為詩材，可以增加詩的醇雅之致。楊鐘羲《雪樵詩話餘集》引吳穎芳之語說：“浙詩國初衍雲間派，尚傍王李門戶，竹垞出，尚根柢考據，擅詞藻而騁轡銜，士夫咸宗之。儉腹咨嗟之吟，擯棄不取；風雲月露之句，薄而不為。浙詩為之大變，其繼別不僅梅里一隅也。”在宗唐宗宋的問題上，朱彝尊鼓吹唐音，貶低宋調，稱“學者以唐人為徑，此遵道而得周行者也”^⑥，批評“今之言詩者，每厭棄唐音，轉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師法蘇黃，下乃效及楊廷秀之體，

① 《清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6 月第 1 版，第 684 頁。

② 《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351 頁。

③ 《曝書亭集》卷三十一《與李武曾論文書》，《四部叢刊》本。

④ 《曝書亭集》卷二十一《齋中讀書十二首》其十一，《四部叢刊》本。

⑤ 《曝書亭集》卷三十七《錢舍人詩序》，《四部叢刊》本。

⑥ 《曝書亭集》卷三十七《王學士〈西征草〉序》，《四部叢刊》本。

叫囂以爲奇，但鄙以爲正”^①。其褒貶標準即在於認爲唐詩中正和平，而宋詩叫囂俚鄙，有悖於雅正之道。

朱彝尊的創作實踐與其詩學主張大體是一致的。他的腹笥之富，當世無匹，發爲詩歌，就表現出學人之詩的特點，即旁搜遠紹，取精用宏，牢籠萬有，性情與學問合一。查慎行《曝書亭詩集序》說朱彝尊“稱詩以少陵爲宗，上追漢魏，而汎濫於昌黎、樊川，句酌字斟，務歸典雅，不屑隨俗波靡，落宋人淺易蹊徑，故其長篇短什，無體不備，且無嫩不臻。”^②指出朱彝尊詩以唐人爲宗，淵懿博雅，不落宋人窠臼。而章太炎說朱彝尊“明日張膽學蘇子瞻”，倒也不是空穴來風。宋鞏就曾說過，朱氏平日論詩，對黃庭堅頗爲不滿。而其詩作頗有高老生硬之致，正得涪翁三昧。其實，朱彝尊詩歌創作從內容到風格是不斷變化的。內容上逐漸遠離政治功利性，風格上基本學盛唐，兼取漢魏六朝，但早期學王、孟之沖淡，中歲學杜甫之遒壯，間學李白之飄逸，晚年又歸宗王、孟，兼對蘇、黃有所取法。在“國朝六大家”中，朱彝尊首開學宋風氣，因此被視爲宗宋之浙派的開山祖師。

早年喪亂之餘，朱彝尊以詩爲史，感念亂離，蘊發無端，笑啼非假，家國文物之感形於言表。劉師培《書〈曝書亭集〉後》曰：“夫朱氏以故相之裔，值板蕩之交。甲申以還，蟄居雒誦。高栗里之節，卜梅市之居。東發、深寧，差可比跡。觀於《馬草》之什，傷滿政之苛嚴；《北邙》之篇，弔皇陵而下泣。”朱彝尊與明遺民詩人一樣最推重忠君愛國的詩聖杜甫，認爲杜詩“其出之也有本，無一不關乎綱常倫紀之目，而寫時狀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則善學詩者，舍子美其誰師也歟”^③，這是他山水詩師杜的根本原因。

中歲以後，朱彝尊長年舟車南北，遠離故土親人，思鄉懷親之情自然鬱積於心。康熙十三年(1674)，他創作了《鴛鴦湖櫂歌一百首》，自稱“聊比《竹枝》、《浪淘沙》之調”^④，內容寫故鄉南湖山水風俗物產之盛，藉以彌補“言歸未遂”之憾。《鴛鴦湖櫂歌》廣泛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嘉禾平原的社會現實，寫出了時代新意。

在出仕清廷以前，朱彝尊的詩富妍暢揚，格律堅勁，如河陽重鎮，旌旗獵獵，令人望而心戰，而仕清時期則多見應酬和應制之體，近體律絕常流入平易，歌行長調，散漫馳驟，有類遊騎，就其詩之精粹嚴整而言，已退一格。歸田之後，朱彝尊生活恬適，多以悠閒的態度，吟誦山水清音，描摹田園風光，表達人生體驗。他在《苕溪詩集序》中曾提到自己詩歌創作的六個變化：“予舟車南北，突不暇黔，於游歷之地，覽觀風尚，往往情爲所移，一變而爲騷誦，再變而爲關塞之音，三變而吳儈相雜，四變而爲應制之體，五變而成放歌，六變而作漁師田父之語，訖未成一家言。”^⑤這六個變化不只是體格聲調之變，更關鍵的是情韻心聲之變。儘管他始終保持着“六代三唐”的標旨，但愈變愈枯朽衰頹。於是，以博識入詩的“學人詩”風範，也就成了淡化真情實意的又一種形態。這“六變”過程，與其詞創作的風格變異以及“浙西詞派”的揚幟過程也有着同步性。^⑥

在南宋以後，詞的發展漸呈衰落之勢，但到清代再度出現復興的氣象，朱彝尊是代表清詞復興的里程碑之一，他與陳維崧一樣在清初詞壇有廣泛的影響。朱孝臧《清詞壇點將錄》以朱

① 《曝書亭集》卷三十八《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四部叢刊》本。

② 《曝書亭集》卷首，《四部叢刊》本。

③ 《曝書亭集》卷三十一《與高念祖論詩書》，《四部叢刊》本。

④ 《曝書亭集》卷九《鴛鴦湖櫂歌一百首序》，《四部叢刊》本。

⑤ 《曝書亭集》卷三十六，《四部叢刊》本。

⑥ 嚴迪昌：《清詩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06頁。

彝尊配梁山泊頭領宋江，對朱彝尊推崇備至。《國朝詞綜》也認為本朝作者雖多，沒有人能超過朱彝尊。郭麐《靈芬館詞話》盛讚朱彝尊詞說：“本朝詞人以竹垞為至，一廢《草堂》之陋，首闡白石之風。《詞綜》一書，鑒別精審，殆無遺憾。其所自為，則才力既富，採擇又精，佐以積學，運以靈思，直欲平視《花間》，奴隸周、柳。姜、張諸子，神韻相同，至下字之典雅，出語之渾成，非其比也。”陳廷焯則在縱觀千年詞史後指出：“余謂聖於詞者有五家，北宋之賀方回、周美成，南宋之姜白石，國朝之朱竹垞、陳其年也。”^①這“五家”分別是詞發展到不同時期的集大成者。就對詞風嬗變的影響而言，以朱彝尊為旗幟的浙西詞派是清代前中期最有勢力的文學流派。

朱彝尊有《江湖載酒集》等詞集四種。《江湖載酒集》之名取之於杜牧《遣懷》“落魄江湖載酒行”，內中固多冶遊之作，但抒發飄轉四方的羈旅情懷，或灑落有致，或哀婉沉鬱，一些感懷弔古之作往往寄託遙深，頗能引起人們的興亡之感。《江湖載酒集》中也有不少豔曲，但都出語清新，歸於雅正，不像柳永《樂章集》徒以香澤為工。由於當時作者處於窮困潦倒之時，其中不乏“假閨房兒女子之言，通之於《離騷》、變雅之義”^②的寄情之作。

朱彝尊有一種貪多和炫才的習性，這種習性集中表現在詠物詞集《茶煙閣體物集》和集句詞集《蕃錦集》中。《茶煙閣體物集》中的詞題以及編排順序是類書式的，依次為節氣系列、物件系列、美人身體器官系列、花卉果蔬系列和動物系列。這些詠物詞“以摛文而兼博物之功”，狀物入微，用典典雅，其中部分早期詞作能以淒切之調抒發身世之感。即便那些粘滯於物的詞，也起到了拓展詠物詞表現範圍、豐富詠物詞表現手法的作用。如西瓜、冬瓜、駱駝、大象等，在以往的詞作中就很少能看到。這一方面固然說明了物質生活的發展以及士人視野的擴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朱彝尊好奇創新的主觀意識。

《蕃錦集》所收一〇九首詞，全以唐人之句集綴而成，而且令、慢皆備，平仄對偶、諧韻換頭，莫不曲中格律，幾乎不能辨其為詩中之句。其調協聲和，文心妙合，王士禛歎為鬼工。《賭棋山莊詞話》舉其《臨江仙·汾陽客感》，及《滿庭芳》、《歸田歡》諸集句長調，與王安石的《甘露歌》、《菩薩蠻》等集句令詞相比較，以為“神工鬼斧，前賢定畏後生，蓋集句長調比短調尤難也”。而且朱氏之集句全部出於腹笥，是以李富孫《曝書亭集詞注》於《蕃錦集》中朱氏自注之出處，發現所注“唐人名氏頗有錯誤”，可見朱彝尊之集句並非翻檢拚湊而得，故能和諧流暢，妙造自然。集句雖屬文字遊戲，畢竟高雅不俗。用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而能如此隨心合意，自然容與，不能不令人歎為此道之絕頂高手。

朱彝尊最為後人欣賞的作品當屬《靜志居琴趣》中的愛情詞。從詞的形式而言，《靜志居琴趣》受到龔鼎孳詞集《白門柳》的影響，採用了聯章的敘事方式，描摹了男女雙方的一段情史。比較而言，在感情的指向上，龔鼎孳更顯明，而朱彝尊則較隱晦；在感情的體驗上，龔氏略輕倩，而朱氏則較凝重。^③這可能是由於龔鼎孳的情人顧媚出身於青樓，而朱彝尊的戀愛對象馮壽貞是良家閨秀，是自己的妻妹。朱氏隱約其詞，吞吐不盡的表達方式倒也帶來了一種深微幽隱之美。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說：“《靜志居琴趣》一卷，盡掃陳言，獨出機杼。豔詞有此，匪獨晏、歐所不能，即李後主、牛松卿亦未嘗夢見，真古今絕構也。”^④陳廷焯極為推崇朱彝尊詞的

① 《雲韶集》卷十六，清末南通王氏晴謫廬鈔本。

② 《曝書亭集》卷四十《陳緯雲〈紅鹽詞〉序》，《四部叢刊》本。

③ 參見張宏生、馮乾《〈白門柳〉：龔顧情緣與明清之際的詞風演進》，《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3期，第184頁。

④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三，清光緒二十年刻本。

“氣骨”，在他看來，朱彝尊的詞“豔而不浮，疏而不流”，有婉約之美卻清勁有力。總體而論，朱彝尊詞嚴於字句聲律，令慢均工，氣韻並茂，言情體物，各造精純。其醇雅的審美風格其實是他的胸襟、性情及懷抱的表徵。

以前的詞家都以北宋詞為詞的最高境界，而朱彝尊卻標舉以姜夔、張炎為代表的南宋醇雅詞派，提出“小令當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諸南渡”^①，其目的是蕩滌花間、草堂之冶豔俚俗，矯正蘇、辛一派之雄豪發露。在詞學理論上，朱彝尊雖然還沒有能完全擺脫詞為小技的傳統觀念，但已開始強調詞的托物寄言功能。

對於明詞，朱彝尊除對崇禎末年之詞稍加辭色外，幾乎是全盤否定。其《水村琴趣序》曰：“夫詞自宋元以後，明三百年無擅場者。排之以硬語，每與調乖；竄之以新腔，難與譜合。至於崇禎之末，始具其體。”^②他認為明詞之衰敝，與學詞者將《草堂詩餘》守為《兔園冊》有極大的關係。為了一洗《草堂詩餘》之陋，朱彝尊選唐五代宋金元詞，編為《詞綜》，“崇爾雅，斥淫哇”^③，採摭繁富，鑒別精審，辨訂詳核，拓寬了清代詞選的選詞視野，推動了清詞的雅化進程。朱彝尊還曾經打算選編明詞，作為《詞綜》二集。他在世之時，雖然編選了幾卷明詞，但沒有刊行。後來，王昶在此書稿的基礎上，廣事蒐集，編成《明詞綜》，完成了朱彝尊的未竟之業。在《詞綜》的影響下，後來衍生出一個“《詞綜》體”的詞選系列。除《明詞綜》外，此系列包括周筼的《今詞綜》、王昶的《國朝詞綜》和《國朝詞綜二集》、陶樸的《詞綜補遺》、吳衡照的《明詞綜補》、黃燮清的《國朝詞綜續編》、丁紹儀的《國朝詞綜補》、林葆恒的《補國朝詞綜補》、無名氏《女詞綜》、劉會恩《曲阿詞綜》，直至當代施議對《當代詞綜》、徐華根《江上詞綜》等。這說明朱氏《詞綜》建立了一種詞選選本的典型範式。在詞的創作方面，由於《詞綜》的影響，數十年間竟形成了“家白石而戶玉田”^④的創作風氣。

在朱彝尊的文學文獻整理計劃中，明代詩歌要優先於詞，《明詩綜》就是朱彝尊晚年獨立完成的巨著。雖然這是一部詩歌選集，卻“以史法行之”^⑤，通過小傳、詩話、詩選的結合，全面記載了有明一代的朝野人物，反映了明詩發展的流程。在敘述史實、審定格律、品第高下的同時，《明詩綜》尤其注意詩人的相互影響關係，有意識地突出了史的發展綫索。朱彝尊“誦《詩》者，必先論其人”^⑥的觀念在《明詩綜》中也有充分的體現，如指出尹耕以命世之才自負，但仕途受挫，坎壈而終，故詩如“曉角秋笳，聽者悽楚”；石瑤為人鯁直自守，不惜違逆上意，雖位列中臺，總不能施展平生，故“詩多蹇產而不釋”；金幼孜“扈駕北征，大漠窮沙，靡不身歷，故其詩時露悲壯之音”。朱氏論詩知人，還表現在他重視詩人的個性對詩歌創作的影響，注意到詩歌創作中詩人的個性與詩歌風格之間的對應關係。在《劉介子詩集序》中他說：“今夫言志之謂詩，持其志之謂詩，故士必先尚其志，而後可與言詩。唐人之作，中正而和平，其變者率能成方。迨宋而龐厲嚙殺之音起，好濫者其志淫，燕女者其志溺，趨數者其志煩，敖辟者其志喬。由是被之于聲，高者硯而下者肆，陂者散而險者斂，侈者窄而韋者鬱，斯末可以道古也。”^⑦

《明詩綜》中的詩話網羅軼事，闡發詩旨，別白體裁，審定格律，區分源流，指明利弊，論述

① 《曝書亭集》卷四十《〈水村琴趣〉序》，《四部叢刊》本。

② 《曝書亭集》卷四十，《四部叢刊》本。

③ 朱彝尊《靜惕堂詞序》，曹溶《靜惕堂詞》卷首，陳乃干輯《清名家詞》本。

④ 朱彝尊《靜惕堂詞序》，曹溶撰《靜惕堂詞》卷首。

⑤ 趙慎畛《靜志居詩話序》，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頁。

⑥ 《曝書亭集》卷三十八《高舍人詩序》，《四部叢刊》本。

⑦ 《曝書亭集》卷三十九，《四部叢刊》本。

更爲精慎，巍然爲詩話中的範本。其中對理學詩體的抨擊表明了其主情的詩學觀，他說：“自堯夫《擊壤》而後，講學勿復言詩，言詩輒祖堯夫，遂若理學、風雅不並立者，然一峰、康齋、白沙、定山，咸本《擊壤》，而定山尤甚，所謂‘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等句不一而足。以是爲詩，其去張打油、胡釘鉸無幾矣。”^①他還說“成弘間，詩道傍落，雜而多端。臺閣諸公，白草黃茅，紛蕪靡蔓……理學諸公，擊壤打油，筋斗樣子。”^②他反對將詩歌視爲“證道”的工具，對理學家的詩作只說理、不言情很反感，故而言道：“文以載道，詩以言志，不詭於道，勿納於邪可也。談理學者，必借詩爲證道之言，若禪家之拈頌說偈者，然吾不得其解也。……元豐而後，理學、風雅截然爲二，大約多祖擊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③朱彝尊是正統的儒家文人和經學學者，卻不是道學家，他推崇文學對人的情感的表現。在這一點上，追求個性解放的性靈派詩人也對他頗爲欣賞。

繼《明詩綜》以後，朱彝尊曾打算編纂《今詩綜》，爲此寫有《征〈今詩綜〉啓》，查慎行也列名於上。不過，朱彝尊的後人也沒有見過《今詩綜》的遺稿，這項工作可能當初並未展開。

大型類書《韻粹》是朱彝尊徵典博物之學的體現。分韻隸事、收集詞藻的類書始自唐代顏真卿《韻海鏡源》，此書已失傳。宋元間編纂此類類書者頗多，傳到後世的有陰時夫的《韻府群玉》。至明代又有凌稚隆的《五車韻瑞》。然而這些韻書都疏漏不完，舛訛相踵。爲了補《韻府群玉》和《五車韻瑞》的闕漏，朱彝尊纂輯了《韻粹》。該書采摭古人詞賦中的新穎之語，分韻編次，共計一百零七卷。其不足之處是采摭不及經史，其詞賦引據他書者也以詞賦爲出典，其缺點與蘇頌《文選雙字類要》略同。朱彝尊生平文字中從來沒有提到此書，而且書中時有闕行闕字，似未完之本。四庫館臣言道：“疑爲摭拾私記，以備詞賦之用。後人重其淹博，轉相傳寫，遂漸至於流布耳。”^④

朱彝尊的古文辭剪截浮囂，峭潔名貴，在魏禧、汪琬之間高參一座。其歷史人物傳記如《王冕傳》、《貝瓊傳》、《徵士李君行狀》等，生動委婉，情神畢具，很少有矯激之言、意氣之辭。其山水遊記如《游晉祠記》、《文水縣卜子祠堂記》等，情景生動，簡潔精煉。其史論如《韓信論》等，見解新穎，議論精當。其金石書畫的題跋大多是他廣蒐博討後的心得，注重考求事實，沒有無根之遊談。潘耒認爲朱彝尊之文爲一代文章之首，他在《曝書亭集序》中說：“竹垞之學，遂於經，淹於史，貫穿於諸子百家。凡天下有字之書，無弗披覽。墜聞逸事，無弗記憶。蘊蓄閎深，搜羅繁富。析理論事，考古證今，元元本本，精詳確當。發前人未見之隱，剖千古不決之疑。其文不主一家，天然高邁，精金百鍊，削膚見根，辭約而義豐，外淡而中腴，探之無窮，味之不厭，是謂真雅真潔。”^⑤顧炎武將朱彝尊之文與清初古文三大家汪琬、魏禧、侯朝宗並列，並說其文高於侯朝宗。

朱彝尊的駢文和賦也有特色，對當時清帝的重大活動和地方風物有認識參考價值。其《春蒐賦》描述了康熙十八年(1679)朝廷的春蒐盛禮，《夜明木賦同澤州陳侍郎作》記述康熙二十二年春(1683)玄燁至山西興縣避暑獲夜明木之事，《省方賦》寫康熙二十二年(1683)玄燁巡視四方之事，《樵李賦並序》則介紹了嘉興特產樵李的種植歷史、特色、傳說、種法等。

朱彝尊對蒐集考證金石文字很熱心，他在《甘泉漢瓦歌爲侯官林侗賦》一詩中自言：“吾生

① 《明詩綜》卷二十八，《四庫全書》本。

② 《明詩綜》卷三十四，《四庫全書》本。

③ 《明詩綜》卷三十三，《四庫全書》本。

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九。

⑤ 《曝書亭集》卷首，《四部叢刊》本。

亦好金石文，南踰五嶺西三雲。手披叢篁斬榛棘，殘碑斷碣搜秋墳。”在給張韶的贈詩中，他以金石學的開山祖師劉敞自比。魏禧也說朱彝尊“歷幕府，則之豫章，之粵，之東甌，之燕，之齊，之晉，凡山川碑志，祠廟墓闕之文，無弗觀覽。故所作文，考據古今人物得失為最工”^①。

元明以來的人文多以金石文字作為騁奇愛博鑒賞之資，故而重於收藏，輕於考證。朱彝尊認為可以憑藉金石文字考證國史的謬誤，其《唐北嶽廟李克用題名碑跋》云：“惟金石之文，久而未泐，往往出風霜兵火之餘，可以補舊史之闕。此好古之士，窮搜于荒厓破冢之間，而不憚也。”^②基於學以致用的思想，朱彝尊把金石學和考據學、校讎學結合起來，突破了前人重藏輕用的舊範。

《曝書亭集》收錄的大量金石跋文，光緒年間由吳縣朱記榮輯為《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六卷行世，書中共收錄題跋一百四十篇。這些題跋內容之豐富精湛使朱彝尊完全能夠躋身於金石名家的行列。王鳴盛在為錢大昕《金石文跋尾》寫的序中說：“古來以金石學名家者七人，宋之歐陽修、趙明誠，明之都穆、趙崡，清之顧炎武、王澐、朱彝尊。”顧炎武對朱彝尊金石考證之精，也曾表示嘆服。

作為清代以金石之文證經史之學學風的開創者之一，朱彝尊的金石學成果對後世影響較大。乾隆時期的學者李富孫本於朱氏的金石碑銘學，撰寫了《漢魏六朝墓銘纂例》。該書自序說：“予惟鄉前輩竹垞檢討之言，因取洪氏《隸釋》、《隸續》所載，益以六朝人碑製，及有墓石之出於近世者，略仿止仲之灋，臚而列之。”此後，研究碑銘的著作，如郭麐《金石例補》、吳鎬《漢魏六朝金石志墓例》、劉寶楠《漢石例》皆本朱氏之言而立說。

清初是隸書的復興期，朱彝尊和王時敏、鄭簠被譽為清初隸書三大家。朱氏重視隸書的學習，其字刻意模仿《漢郃陽令曹全碑》，結體方扁端莊，疏密有致。更主要的是，其點畫純從漢碑中來，行筆扎實穩重，不像當時其他人那樣隸、楷筆法相混雜，而作為隸書特徵之一的波磔用筆，也是出之以自然之致，不強努硬挑。朱彝尊不僅對《漢郃陽令曹全碑》下過很深的工夫，而且能準確地體會和把握漢隸的整體審美意韻，故其書作渾雅平和，古意盎然。梁章鉅在《退庵書畫跋》中說：“漢隸在前明幾成絕學，至竹垞力思復古，而曲阜、任城諸刻始盛行於時，《曹全碑》以晚出完好，故刻意模仿。同時程穆倩、林吉人、顧雲美、鄭谷口輩，自命為書八分者，皆先生為之提倡也。”朱彝尊的行書可入逸品，林則徐曾在朱彝尊的一份手稿上題寫跋語說：“氣韻渾雅，出於天然。”

三

順治十三年(1656)，朱彝尊客遊廣東，往返兩載。順治十四年(1657)，他將自己的粵行詩集為《南車草》一卷，並將酬贈曹溶的詩作輯為《薇堂和章》一卷，一同刊刻行世，蔗餘道者作序曰：“錫鬯來僊城，有《南車草》之刻，不減杜甫發秦州至成都時。此雖錫鬯大海中波瀾數疊，然瀛渤全潮無有二用。人或以錫鬯之詩盡其才，以錫鬯之詩才盡其用，皆不礙於錫鬯之所自託。”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蔣楷得初印本重刊。海寧蔣學堅《懷亭詩話》卷三曰：“竹垞太史早年所刻《騰笑集》、《竹垞文類》，世多見之，而《南車草》及《薇堂和章》流傳絕少。先大父得舊刻初印本，因重鋟諸板，以廣其傳。時在嘉慶戊寅，距太史初刻之在順治丁酉者，已百六十有

① 魏禧《朱錫鬯文集序》，《魏叙子文集》上冊，中華書局2003年6月第1版，第387頁。

② 《曝書亭集》卷五十，《四部叢刊》本。

二年矣。”除刊本外，國家圖書館還藏有《南車草》的三種清抄本。

康熙十七年(1678)，嘉善柯維楨將朱彝尊的集句詞集《蕃錦集》二卷輯編刊刻。此刊本有柯維楨序云：“自嚴儀卿論詩，別唐爲初、盛、中、晚，高廷禮遂按籍分之。同一開元也，或爲初，或爲盛。同一乾元、大曆也，或爲盛，或爲中。論世者因之定聲律高下。予嘗惑之。近見同郡朱錫鬯集唐人詩爲詞，取而讀之，不能辨其爲詩中之句，又何初盛中晚、聲律高下之殊焉。乃知拘方之論，不足語於賞音者也。而予之惑，庶幾可釋已。乃編爲二卷，爲鏤板以傳好事之君子。”《蕃錦集》後被收入朱彝尊“晚年手自刪定”的《曝書亭集》，成爲《曝書亭集》的第三十卷。

康熙十一年(1672)，朱彝尊編成詞集《江湖載酒集》。康熙十八年(1679)，龔翔麟取朱氏《江湖載酒集》與李良年《秋錦山房詞》、李符《未邊詞》、沈皞日《柘西精舍詞》、沈岸登《黑蝶齋詞》與自己的《紅藕莊詞》合刻於江寧，名《浙西六家詞》。此《浙西六家詞》本《江湖載酒集》三卷，通常稱爲康熙十八年錢塘龔氏玉玲瓏閣刻本。除此之外，《江湖載酒集》還有以下主要版本：

1. 台北中央圖書館藏朱彝尊手稿本，即《竹垞太史手定詞稿》，含《江湖載酒集》六卷，《茶煙閣體物集》三卷，《靜志居詩餘》二卷，《葉兒樂府》一卷。
2. 清聶先、曾王孫編康熙綠蔭堂刻《百名家詞鈔》本。
3. 清嘉慶九年(1804)刻《浙西六家詞》本。
4. 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浙西六家詞》本。
5. 上海開明書店民國二十六年(1937)鉛印《清名家詞·曝書亭詞三種》本。
6. 1974年臺北文海出版社據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朱氏手稿本影印出版《清代稿本百種彙刊》本。

《江湖載酒集》已被收入《曝書亭集》，成爲《曝書亭集》的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和第二十六卷。

據說，朱彝尊與陳維崧曾合刻《朱陳村詞》。蔣景祁《迦陵先生外傳》言道：“先生嘗自中州入都，同秀水朱竹垞合刻一稿，名《朱陳村詞》，後流傳入禁中，蒙賜問，文人榮遇自古罕有。”（《碑傳集》卷四六）照此說來，朱、陳合刻詞稿是在康熙七年(1668)。因爲陳維崧一生僅二次入京師，第一次即康熙七年經周季琬等介紹，取道中州入京拜訪龔鼎孳等人，逗留數月後即南歸；第二次是應博學鴻儒之召赴京，四年後就死在京城陋居。問題是第一次入京時，陳維崧與朱彝尊並未見過面。朱彝尊爲陳維崧作《紅鹽詞序》：“宜興陳其年，詩餘妙絕天下，今之作者雖多，莫有過焉者也。其弟緯雲繼之，撰《紅鹽詞》三卷，含宮咀商，駸駸乎小絃大絃迭奏而不失其倫。噫！盛矣。其年與予別二十年，往來梁宋間，嘗再至京師，一過長水，謂當相見矣，竟不值。而緯雲留滯京師久，予至，輒相見，極譚燕贈酬之樂，因得詢其年近時情狀。”^①此序寫於康熙十二年(1673)，文中“其年與予別二十年”，是指他們於順治十年(1653)在嘉興南湖舉行的“十郡大社”上相識。從順治十年到康熙十二年，恰爲二十年，這二十年中二人未能相遇過，不可能於康熙七年在京城合刻《朱陳村詞》。蔣京祁雖然是陳維崧鄉裏後輩，曾隨侍迦陵多年，但他生於順治三年(1646)，年齒較稚，有些事得之傳聞，難免有訛差。即以“文人榮遇自古罕有”云云，也不當指康熙七年陳維崧落魄之時，移後十年指“鴻博”應試之事，庶幾差似。而《朱陳村詞》僅見傳聞，至今未見傳本，實系疑案一宗。^②

① 《曝書亭集》卷四十，《四部叢刊》本。

② 嚴迪昌：《陽羨詞派研究》，齊魯書社1993年版，第86、89頁。